

羅定党史資料

第一辑

中共罗定县委党史研究室编

一九九二年五月

罗定党史资料

第一辑

中共罗定县委党史研究室编

封面题字: 梁 嘉
主 编: 徐 东 陈忠能
责任编辑: 范光龙
校 对: 林明进

罗定党史资料
第一辑
中共罗定县委党史研究室编
广东省罗定县人民印刷厂印

广东省出版物印刷许可证
第144号

目 录

在党史座谈会上的讲话

(1981年6月)

梁 嘉：抗战时期罗定党组织的工作概况………	(1)
唐 章：从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到武装斗争的 发展……………	(10)
李镇靖：三罗地区武装斗争点滴……………	(26)
吴 桐：三罗武装斗争情况的回忆……………	(32)
谭丕桓：罗定武装斗争情况简介……………	(40)
伍伯坚：解放战争时期罗定党组织领导的武装 斗争情况……………	(51)
俞小曼：在罗定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回忆………	(61)
谭朗昭：我在罗定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概要……	(67)

党史回忆录

杨 甫：抗日战争时期罗定党组织的重建和救亡 活动的开展……………	(74)
黄万吉：在罗定从事革命活动的回忆……………	(84)
戴卫民：解放战争时期罗定的几场战斗……………	(88)
丘子平：在十四团的日子里……………	(94)

(在党史座谈会上的讲话)

抗战期时 罗定党组织的工作概况

梁 嘉

几十年没有与老朋友见面了，这次大家见面非常高兴，也是互相学习的好机会。现在中央指示要写好党史，我们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利用了这个机会把资料留下来，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。

三岁的事情，唐章最清楚，我在这里时间不长，1938年来，到1940年调走了。讲话时要有骨有肉，又有灵魂，这样就难了。对过去的事，需要大家来凑情况，实事求是地谈。我今天可能讲得不准确，希望大家补充、纠正。我所讲的问题就只有一个片断，一段时间的一个片断。我现在分三个方面来讲。

一、首先讲一些线索。大革命时期，估计还有个把党员留下来，但是作为组织上来讲就没有了。1938年罗定党是重建的。当时西江特委把罗定党的工作，当成重点，花力气最多，来得最多。当时西江两岸，江北有广宁、江南有罗定。西江特委大概在1938年11月初成立，第一任书记是李守纯，我当组织部长，朱荣同志当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。李守纯同志做到1939年3月就走了，王均予同志当书记，我与朱荣同志

任务不变。到1939年9月王均予同志调走，刘田夫同志来，我还是组织部长，宣传部长是梁威林同志，朱荣同志去延安参加“七大”，这时增加特委委员杨甫。到了1940年，省委分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，同年夏天，大概是4月，省委调我走，在省委学习后，我就调到南路准备接周楠同志工作，当特委书记。刘田夫调到粤中当特委书记，冯燊调来西江特委当书记，在冯任内，梁威林仍任宣传部长。冯燊来的时间不长，大概两年，就遇上“粤北事件”。“粤北事件”是什么时候呢？是1942年5月份。我1942年是从南路调到粤中去，同刘田夫在一起了，大概同年7月，临时省委派吴超炯同志到粤中来，传达临时省委指示，并转告粤北省委被破坏情况。并命我迅速派人到西江及南路传达。我即转达吴超炯同志到西江找冯燊同志，同时我亲自到南路向王均予同志传达。为了避免党再受损失，临时省委决定停止组织活动，各自找职业隐蔽下来，当时还提出“三勤”：勤交友、勤学习、勤工作，作长期埋伏打算。你们这边传达正式上边的命令时间，应该是8月。根据以后了解，三罗基本上执行了这个指示，把“红”的人统统调走，如你这里的黄万吉，我们叫他做“黄老吉”。他是从新兴调来，是新兴县的书记。

到了1944年，冯燊就已经同省委联系上了，根据省委指示，要逐步恢复组织，准备武装斗争，唐章、谭丕桓、黎百松、欧新、王炎等，执行这个指示，将三罗党的同志一个个审查，党组织就这样恢复了。西江党组织分南北，但这个时间也不长，大概到了1946年6月，两岸的武装同志都北撤山

东，我也调到香港分局工作了，指定我联系西江及粤中地方党组织和武装，与我联系的谭丕桓同志。是1946年6～7月，到1947年的6～7月，大约是一年的时间，陈家志那时在德庆那边，仍然是谭丕桓同他联系，到了准备起义后，我们才与陈联系上。到了1947年4月，我回西江游击区了，粤中游击队又恢复了活动。这时西江南北工作又分开来，一直到解放。

从1938年11月开始，罗定党重建与活动，大致跟着这条线索而发展的。还有俞福亲、黄焕秋、刘秉楷等同志，带社教实验团来到罗定；还有杨甫（即杨昌龄）、谭朗昭是分散的，在罗范群同志的帮助下，开始成立中心支部，李志坚任支书、组织委员是杨昌龄，宣传委员是黄焕秋、青年妇女委员是俞小曼（俞福亲），以后，李志坚（李光）走了，由俞福亲（俞小曼）主持支部工作。西江特委成立之后，便将罗定党组织关系接过来。1938年12月我到德庆，再从郁南转过罗定，我们也见面了。

1939年初，黄焕秋很早走了，谭朗昭接做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。我记得有个学生头参加了支部。这个人很有魄力。罗定党的重建的线索大概是这样。有了党的领导之后，罗定党的工作可以说是一日千里地发展了，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。

二、罗定党组织是怎样做工作的？当时西江特委要求罗定县委做五条，这时特委来罗定的人和次数最多，时间又最长，我本人也来过多次，刘田夫同志来了，朱荣同志来了，李守纯同志也来了。杨昌龄同志蹲在这里一段时间，相当一

个时期，梁威林同志也蹲在这里，这说明西江特委把罗定作为很重要的地方来抓。我知道罗定比较穷，但读书人最多，中学最多。另外，当兵人也多，十九路军的基础在这里。罗定还有一点，地方势力雄厚，如蔡廷锴、谭启秀，还有十九路军的中下层干部不少。加上罗定本身是个军事必争之地，四通八达，甚至国民党撤退出广州时，国民党有两个据点，一个是在连县，省府搬去连县，另一个是西江以南的罗定。所以，这时撤到罗定的机关很多，中山大学等两间大学，还有长城、金陵中学，国民党其他机关也搬到罗定来，庚戌中学也搬到连滩河口。十九路军有个“一·二八”上海抗战，有个福建人民政府，这些影响都有潜力，不能小看。根据当时这样的位置和情况分析，我们的特委把罗定当成一个很重要的点来抓。我们要罗定党组织怎样做工作呢？

（1）抓青年运动，发挥青年先锋作用。开始来到罗定是俞福亲、黄焕秋、谭朗昭、杨昌龄等同志，这些同志算是罗定青年运动的“开国功臣”，以罗定中学为中心，以后又把金陵、长城中学开展起来。第一个学生党员是陈汉源。是青年运动的骨干分子。抗先队到罗定对青年运动起了促进作用。俞福亲、谭朗昭、黄焕秋等同志，都是抗先队员，对党的青年运动工作是有经验的。真正高潮发展在是1938年底到1939年日本轰炸罗定后，“青抗会”发展到最高潮。除了县城以外，罗镜、素龙、太平、泗纶，还有大湾都建立了“青抗会”分会。发展到高潮时，大概两千人，主要是学生，也有些农民队员，做的是宣传党的抗日政策，组织青年，采取多种形

式如写标语、演戏。如话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，还有歌咏团等，利用圩期演讲，会场也简单，因为讲的是抗日道理，就有人听，你讲越是实际，听的人就越容易接受。青年运动，为党打下了基础。通过青年运动，也为今后建党建军培养了骨干，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。为你们后来在三罗搞起武装撒下了种子。

(2) 抓抗日宣传。当时很重要的一件事，是把书店办好，办《三罗日报》。那时西江的进步书店有四个（肇庆、罗定、四会、郁南），罗定的书店叫做汇合书店。《论持久战》和毛主席其他军事著作，也是这时候看的。那个时候开书店，主要是卖进步的书，向群众宣传，使群众看到中国是有希望的。有八路军、新四军，就有希望。对引导青年往抗日道路上走有很大的作用。《三罗日报》开始是一种统战形式。是由蔡廷锴题词的、集资各方面的人都有。但实际掌权的是谭朗昭，是个主编。其中办了个副刊叫《大众》，这是我们自己掌握的。梁威林花了很大气力，刘田夫又会写文章，刊登在这里，宣传抗日政策，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，但都起了很大的作用。《三罗日报》利用十九路军西江办事处的电台，每日用它几条消息，很新鲜。国民党对我们这个报纸恨之入骨，要想办法限制，取消这个报纸。但这个报纸坚持一年多，为我们的宣传工作做了很大的贡献。

(3) 统战工作。统战工作是三大法宝之一。统战的对象就是十九路军在罗定的将领及其中层干部，主要是争取地方势力的支持。罗定的地方势力是有家乡观念，宣传十九路军如何抗日，他们是高兴的。我们宣传党的抗日政策，与宣传

十九路军抗日，这是不相矛盾的，是统一的。他们要我们支持，我们也要取得他们的支持，这个工作由谭朗昭负责。我知道谭朗昭同志与地方势力有瓜葛，如十九路军有王作华，是个师长，是他父辈的好朋友，而且其父有恩于这个师长。他的哥哥谭明昭是蔡廷锴的秘书，他还与谭启秀有点关系，1939年下半年那个时候，形势已紧张，有些地方国民党已动手了，罗定这个地方还没有，所以统战工作起了很大作用。

(4) 抓建党。罗定党支部建立起来以后，很快就发展了。到1939年初，大概有五、六十个人了，但主要是学生，当时特委指出他们工作上的缺点，认为这样做生不了根。要在生产单位职工中发展党员。陈守序是谭朗昭发展的。另一个缺点是没有深入到农村去，要在农民当中发展党员。特委指出这个问题之后，罗定党组织就在泗纶和罗镜开始发展党员，逐步生下根。在当时对西江党来说，罗定是党员比较多的县份之一。

(5) 办训练班。培训党员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。我们在这里办训练班，办了很多期，讲党的基本知识、党的任务，讲党的纪律，讲保守党的秘密。还讲青年工作，抗日政策。时间有长有短，最多一个月左右。这对培养干部起了很大作用。培训对象除了本地党员外，还有外县的，有支部书记或者可以培养成为干部的同志。因为这里党的基础较好，统战工作做得好，消息比较灵通。特委要求罗定县委做的工作就是这些。我认为罗定党组织工作是卓有成效的，完成任务比较出色。

三、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问题。在罗定，地方势力强，

这是有利方面。在统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不仅仅在县内做，而且在三罗各县也找与十九路军有联系的人来做。这点对我们同反动派斗争是比较有利的。但是，“好景不长”，我们的“好景”大概是到1939年上半年止，1939年下半年罗定活动就开始艰难了。1938年底，国民党有很多命令来了，什么限制异党活动，限制这个，限制那个。1939年初，撤销第四战区“动委会宣传队”，我们“抗先”到1939年1月份取消了，要把所有“抗先”队全部集中到翁源训练。当时我们西江特委决定不要管他。你撤销你的，我不走是我的事。我们这批“抗先”队象宝贝似的，作为发展西江地区工作的主要力量。“抗先”队在西江有近二百人。没有走的队，都是开始分散隐蔽，同他们斗争，斗争方式多种多样。你要我拆“抗先”的招牌，我就不拆，同他们斗争，着重揭发他们较多，揭发他们反共不抗日，讲我们的抗日道理。他们的手法，限制、赶走、抓人三部曲。郁南顶不住了，罗定还可以顶一阵子。罗定为什么能顶得住一阵子呢？他们对付我们也有几种方式。首先是限制，限制活动限不了，就来拉拢、分化、瓦解、恐吓，第三条呢，就是拉人封屋。大概是三种手段都用到了。首先是限制活动，不准罗中学生活动。那时罗中开除了几个抗日积极同学，这件事当时是当作大事来办，经过斗争，后来这几个同学转到长城中学去了，这个斗争算胜利了。从此，在学校的共产党员威信更高。第二，由于敌人恐吓拉拢，结果我们罗定的党员中有个别被拉过去。第三个问题是拉人、封铺。封《三罗日报》，封汇合书店，捉谭朗

昭、张一鸣、陈公朗、吕友（印刷工人）。所以说敌人对我们不是有什么善心、慈心。敌人想破坏我们党组织是蓄谋已久的，由于各种原因而达不到他们的目的。《三罗日报》，他们就恨得要死了。但是，这是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题词的，有地方人支持的，它又宣传抗日。到1940年3～4月，《大众》副刊有篇揭发国民党反共的文章，是刘田夫同志用铁夫名字写的，揭到他们痛处，以后动手了，拉入封铺，《三罗日报》和汇合书店都被封了。跟着“青抗会”被解散。所以，这个斗争，不是敌人不想，而是他们早已想做了，他们早已有实际行动。但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做了很多工作。一是我们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，有地方势力支持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但不是主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断地揭发他们，我们讲抗日，正面宣传抗日。我们工作活动形式由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活动转入地下，行动采取合法形式。对已暴露的同志，疏散转移到外地或农村去，扎实地到下面去工作，这样就保存了党组织，免遭破坏。我们被捕的几个同志比较坚强。

罗定重建党之后，工作是有成绩的，这是执行省委指示及在各任特委同志帮助下取得的。在1938年，1939年上半年，着重扩大抗日宣传，宣传党的政策，组织群众，组织青年，条件成熟时发展入党。在逆流来到之后，我们的方针采取十六个字：隐蔽精干，长期埋伏，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。1945年以后，这段时间着重是搞武装斗争，同时在地方工作中，仍然是坚持长期埋伏的方针。我今天讲的是从1938年底到1940年5月左右这一段时间。1940年7月之后，我调

到南路去，以后的情况我不清楚了。这要唐叔他们才讲得清楚，以后他在这里活动时间长。三罗是唐叔的第二家乡，在这里滚得一身泥。1946年6月到1947年7～8月左右，武装北撤之后，未曾恢复武装斗争这一段时间，我在分局工作时还与西江联系的，是同谭丕桓联系的。这段的情况要请谭丕桓才讲得清楚。武装斗争这一段要唐章、李镇靖等同志来讲。我今天就讲那么多。

从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到武装斗争的发展

唐 章

首先感谢罗定县委和县委负责同志给机会，使我和过去的老战友共同讲讲过去的历史。同时，感谢罗定县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这次座谈会，感谢罗定县府的热情接待。这对我们是很高兴的事。

我觉得对罗定党史的回顾，有着重要的意义，首先的意义是，从罗定一个县的党组织来看西江。也可以说，从罗定党看出西江党走过的斗争历程。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斗争，都在罗定党身上有反映。从罗定党的经验教训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有着强大的生命力，从幼稚、不成熟，逐步受到锻炼，成为比较坚强的党组织。从罗定党的发展过程，更可以看出和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。列宁有一个名言：“忘记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”。回顾过去，更鞭策我们要跟党走，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对青年一代，接受过去的教训，知道历程是怎样的，应该有自豪感、光荣感。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，感到做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光荣的事，是自己的理想。如果我们的党史起到这样的作用的话，就了结了我们的心愿。

抗战时期罗定革命斗争的历史问题

罗定历史的简单回顾。罗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大革命时期，轰轰烈烈地进行农民运动，轰轰烈烈地搞好农民革命，在罗定高高树起共产主义的旗帜。这里牺牲了许多先烈，李芳春就是佼佼者，李芳春是罗定广大农民英勇的代表。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党组织就受到摧残。虽有李芳春的同志在这里，但没有党的领导，党组织的活动中断了。整整十年时间，罗定处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，是封建法西斯的专政。没有一支力量，没有共产党同它较量，罗定是一片空白。到了1937年“七·七”前后，罗定人民、罗定的青年，响应党的号召，在罗定搞起抗日运动。他们很活跃，要求进步，要求真理。有的已参加了共产党，象谭朗昭这些人。

广州沦陷前夕，广东省委组织广州大批工人、学生分赴到全省各个地方，担负起抗战责任，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。来到罗定的有俞福亲、杨甫等大批同志。他们本身有一个党支部，通过他们的活动，进一步把罗定青年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、一个新的高潮，全罗定搞得轰轰烈烈。

在蓬勃发展的青年运动基础上，建立了一个比较大的党组织，西江党组织，江北强有力的当然是广宁县党组织，农民党员都有二、三百人。在江南比较大的党组织当然是罗定，她是在青年运动、救亡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当时罗定集中从广州转移来的单位，有勳大，有文理学院等等。因此，罗定成了文化阵地，各方面人物都在这里，由于有这

样的条件，青年运动发展得很迅速。这时书店搞起来了，印刷厂搞起来了，《三罗日报》在这里办起来了。这就不仅仅限于罗定这个地方。它会影响整个西江。因此，后来刘田夫、梁嘉同志到来时都把希望寄托在罗定党的身上，寄托在罗定人民身上。这个时候是个大发展，群众运动的大发展，党组织的大发展，党员都参加了公开的抗日活动，青抗会成立了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高潮。在时间来说，是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上半年。这是一个阶段，是一个发展的阶段。当时省委提出大力发展，罗定党是根据省委和西江特委所提出的方针来活动的，是有成绩的，对西江革命事业是有贡献的。

接着抗战转入相持阶段，1939年3月，国民党提出限制异党活动的方案。1939年6月李汉魂从重庆返广东，布置如何反共，派出大批爪牙到各个地方去，在罗定就是林森曾、黄达材等。这些人很反动，坏透了。他们控制着罗定国民党部和政府部门。政治逆流开始冲击罗定。在西江来说，斗争比较集中、比较激烈的就是罗定。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，在罗城的反动派制造各种舆论，说青抗会窝藏有异党，学校有怎样的不轨活动，等等。还提出要解散青抗会。还采取反动的军训措施。党领导学生起来进行反对。这里，比较活跃的人物有陈汉源、张纯纲、区映寰、邓登鸿、潘焱荣等几个人。国民党县党部首先从这些活动分子开刀，将他们开除出罗中。这更引起学生的反对。斗争的结果，国民党被迫让步，答应这几位同学转学。

但是，国民党并没有就此罢休。到1940年1月西江的政治逆流已经进一步发展。国民党开始抓人，把进步青年投入监狱里去了，开始用武力镇压。罗定就在这年的4月、5月强行解散青抗会，跟着就是把书店封闭、印刷厂封闭、《三罗日报》封闭，逮捕我们党的骨干谭朗昭、张一鸣、陈公朗、吕友。西江党组织为着领导西江人民，领导西江党员起来打击敌人的阴谋、将罗定作为宣传阵地，出版《大众》作为《三罗日报》的副刊，实际上是西江党组织的一个喉舌。刘田夫同志亲自执笔写社论，梁威林同志主编，在罗定发行，当时散播到整个西江了。《大众》及其刊登的文章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，揭露了他们的阴谋，扩大了党的影响，这是罗定党、罗定人民对西江革命事业的贡献。当然，由于斗争激烈，罗定也承担着反动派集中力量打击的风险。反动派果然动手了。书店被封闭、印刷厂被封，人被抓了。出现了这样的事件之后，省委和特委都很关心，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，把广大党员、广大骨干进行掩蔽分散。一百名或一百多名的党员陆续地先后分散出去，这些党员干部分散到各个地方开花结果，罗定从此进入另外一个时期。这个阶段，当时广东省委在1940年上半年总结了几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训之后，提出了一系列转变措施。罗定党组织根据这样的指示，接受了这样的经验教训，使罗定来一个比较大的转变，转变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首先是从轰轰烈烈的，大规模的，公开的政治运动，转变到围绕抗战，围绕进步，围绕团结来开展经济上、文化上